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研究丛书之二
邓纯东/丛书主编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确保民富国强的中国经济发展之路

ZHONGGUO TESE
XINXIANG XINGUANDIAN XINLUNDUAN YANJIUCONGSHU ZHI ER

王佳菲/编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研究丛书之二

邓纯东/丛书主编

金融（112）目前版本样稿

将全国打造成富国富民的：要教育引导全社会形成尊崇中国共产党、信赖党中央、拥护习近平、热爱伟大祖国、热爱伟大人民的思想共识和情感认同。

8.6103

“博采古今、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治学理念，坚持“三个面向”，弘扬“三严三实”精神，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纪律严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五、健全激励机制，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确保民富国强的中国经济发展之路

王佳菲/编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本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研究对象，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等多维度、多层次、多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二）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四）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五）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六）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七）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八）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确保民富国强的中国经济发展之路 / 王佳菲编著 .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 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研究丛书之二)

ISBN 978-7-5035-5138-3

I. 中… II. 王… III.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研究 IV. F120.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4073 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确保民富国强的中国经济发展之路

策划统筹 王君

责任编辑 赵静

版式设计 宗合

责任校对 高鹏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 编 100091

网 址 www. dxcbs. net

电 话 (010) 62805800(办公室) (010) 62805824(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2.375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丛书总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 90 多年艰苦奋斗的伟大成果与伟大创举，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关键在于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说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特色，就是要更加注重高扬时代旋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贴时代脉搏、顺应时代潮流、吸纳时代精华，从而具有更加远大的美好前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经过 30 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成果颇丰，但党的十八

大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制度进行了全面阐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如科学发展观的新定位与新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新拓展，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些新思想，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新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部署即总依据、总布局与总任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开启科学发展新篇章的新观点，提出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举的光辉旗帜，增强中华文化整体实力与竞争力、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新论断等。中国社科院马研院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的思想库智囊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很有必要组织力量系统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套丛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共六本，就是我们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初步成果，敬请读者批评。

邓纯东

2013年3月



目录 CONTENTS

丛书总序	I
导 论	1
一 东方大国建设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之路	4
(一) 上下求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1978—1992年)	4
(二) 全面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车道(1992—2002年)	12
(三) 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2003年至今)	19
二 牢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大厦之根基	27
(一)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体现在“两个毫不动摇”上	27
(二)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34
(三)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55
三 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60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姓“社”不姓“资”	61
(二)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65
(三)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71

(四) 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78
(五) 提高国家宏观调控水平	84
四 推进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93
(一)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94
(二) 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100
(三)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107
(四) 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114
(五) 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117
五 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124
(一)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124
(二) 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与原则	131
(三)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37
(四)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145
(五) 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151
六 绽放于世界舞台的社会主义经济活力	160
(一) 在抵御经济危机冲击时彰显中国道路的优势	160
(二) 国外学界如何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道路	166
(三) 以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制度特色解密“中国奇迹”	176
参考文献	185
后记	187

导 论

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关键一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短短 30 余年间取得了堪称人间奇迹的辉煌成就，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无愧地告诉历史、告诉世人：我们走的是一条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这就是在以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基础上、开创于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90 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之一。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完成，同时又意味着另一场伟大征程的启航——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此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艰辛探索。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包括独立自主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成功开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 20 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这两个历史时期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密不可分，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道路为经济理论形成发展和经济制度创新完善提供实现途径与实践基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经济发展道路拓展和经济制度创新提供行动指南与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则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规定了道路探索的前进方向和理论创新的价值取向。实践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理论的创新、制度的完善也没有终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道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既不可分割，又有各自的特定领域和特殊规律，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整体。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方向。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物质基础，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巩固和生产关系的完善为推进上层建筑的建立健全奠定经济基础，因此，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同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巩固着精神支撑，社会建设为各项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并切实改善民生，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利于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永续发展。

在上述基本认识的基础上，本书聚焦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紧扣党的十八大精神及报告在经济改革与发展领域的一系列新提法、新亮点，努力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伟大实践，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持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的有机统一。全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波澜壮阔的探索历程作为开篇（第一章）；继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推进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推进四个维度，对这条道路各个重要层面的理论逻辑、发展成就、存在问题、前景方向等进行了全景解析（第二章至第五章）；最后则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国际角色、国际认知、国际比较之视角，说明“中国经济奇迹”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及其内在蕴含着的制度优势（第六章）。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的共同目标，是多年来萦绕在每一个中华儿女心中的“中国梦”。一步步将这个共同梦想照进现实，既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也是中国人民开拓、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伟大历程。随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包括经济发展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让我们胸中怀着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走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转折。它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自此，“改革”和“发展”这两个要素共同奏响了新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时代旋律。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的历史阶段。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辉旗帜。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突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突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一系列成就不仅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而且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武器。

（一）经济体制改革率先突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方法，高屋建瓴地指明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人民公社各种组织形式的公有化可以适当缩小，也可以逐步取消。他强调：公有制为主体的单层经济结构，同中低水平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不能不发展商品经济。他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他强调：商品经济是计划经济的手段，计划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公有制基础。邓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断，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曲折的、复杂的工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逐步形成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同志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

东方大国建设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之路

从历史的风雨中走来，在时代的潮流中前行，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是一条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富裕的康庄大道。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阐明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使我们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

(一)

上下求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1978—1992年)

由中国共产党担当舵手的新中国，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工业化进程旋即展开，生产关系的改造与工农业的建设同步进行，在经由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之后，正式踏上了探索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征程。

这是一段艰辛、曲折和复杂的奋斗历程，其间既不乏凯歌行进的光辉岁月，也记载下了令人痛心的严重挫折。这一历史时期尽管没能描绘出一条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轨迹，但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成功开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这一历史时期的探索，既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又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完成，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拉开，乡村与城市处处释放出新的活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一个新时期。

1.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入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转折，也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转折。大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自此，“改革”和“发展”这两个强音共同奏响着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时代旋律。

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说明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取得了重大成果。经过调整，到1981年底，农、轻、重比例关系有所改善，基本建设规模得到了压缩，财政赤字由1979年的170.6亿元、1980年的127.5亿元迅速下降到25.5亿元^①。市场供应、对外贸易、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也有了改善。这一系列收效不仅巩固了经济建设的根底，而且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准备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稳定局面。

（1）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突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提出，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实际上，此前安徽和四川等地已经开始放宽农业政策，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试行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人民公社各级组织的分配可以记工分，也可以包工到作业组联产计酬；虽然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但同时也允许了某些情况下的包产到户。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25、445页。

面对一些农民群众自发实行的包产到户，以及由小岗生产队扩散开来的“大包干”等形式，从上到下存在着不少疑虑和争论。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后印发的座谈会纪要指出：“就全国而论，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①这个文件下发后，包产到户、“大包干”迅速发展，1981年下半年以后已遍及全国，到1982年6月，实行农户家庭承包的生产队占86.7%，1983年初进一步上升到93%，其中绝大部分是包干到户。^②农村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取消人民公社制度，结束了农业生产中的“大锅饭”，在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基础上，使农民通过承包土地拥有了经营自主权，充分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适应改革形势的进展，党中央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制定了5个指导农村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继续逐步放宽政策。

关于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1980年5月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的谈话中说：“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③

（2）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探索

我国城市改革的首要关键环节，是尚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下的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步是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1978年第四季度，四川省率先在宁江机床厂等6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允许他们在实现目标以后分享少量利润，取得了较大收效。在国务院的部署下，到1980年6月，全国大中型试点企业发展到6600个，约占预算内工业企业总数的16%，产值的60%和利润的70%。^④

1981年春，山东省开始实行经济责任制，并很快在全国推广，包括原来的试点企业也纷纷转向经济责任制。同年9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家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全面试行经济责任制。到1982年底，全国推行经济责任制的

^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政策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② 周太和：《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3—27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④ 王洪模等：《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已占 80%，商业企业占 35%。1983 年绝大部分国营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都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并涌现了像首钢这样的一些先进典型。企业经济效益得到了很大提高，1984 年，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 8.7%，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销售收入比上年增长 10.4%，实现利润和消费税比上年增长 10.5%。^①

经济责任制打破了国家统收统支的局面，通过合同明确国家和企业的责权利，使所有权和经营权得到了初步的分离，企业在完成上缴利润后，能够获得较多的盈余用于自我积累和提高职工收入，因此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都得到了发挥。但是，这种形式也存在不少弊病，例如，包盈容易包亏难，自负盈亏实际上仍然无法实现；承包期短，容易导致承包者在企业经营中追求短期盈利而不考虑长远发展，等等。因此，它只能作为一种探索和过渡的方法，并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长远发展方向。

（3）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出

1979 年 3 月，邓小平曾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指出，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②

1982 年 9 月，党的十二大开幕，邓小平在致开幕词时正式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③ 大会提出了从 1981 年到 20 世纪末的 20 年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即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此外，大会对于如何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和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原则，坚持自力更生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问题，确定了一系列方针。^④

① 赵士刚主编：《共和国经济风云》（下），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33—434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94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 页。

④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4—25 页。

2. 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1）增强企业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中心环节

《决定》强调：“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并且为国营企业改革指出了方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就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来说，今后各级政府部门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① 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作为企业改革的目标，提出政企分开，这些创造性的提法都成为此后国企改革的重要方针。

为促进国有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从1980年起，一些省、市、自治区开始进行“利改税”试点，并取得较好效果。1983年和1984年，国务院分别推行了“税利并存”的第一步利改税和“以税代利”的第二步利改税。实行“利改税”，初衷是要把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用税收的形式加以规范，让企业摆脱条条框框的行政束缚。但实行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尤其是第二步改革，为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而制定了较高税率，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在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来源方面，1985年国家正式实行“拨改贷”，凡是由国家预算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尝试使企业资金来源由“软约束”变为“硬约束”，从而加强对企业的投资管理，培养企业的投资风险意识。但是，由于政企不分等问题依然存在，“拨改贷”并没能有效改变国有企业盲目“铺摊子”的扩大投资需求冲动，同时还增加了企业的债务负担。

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此时的经营承包，与之前曾经实行过的经济责任制相比，形式更加多样，鼓励依据不同条件试行租赁、承包经营，进行股份制试点，允许拍卖或折价出售一些全民所有制小型商业、服务业企业。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

^①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4—565、565、565—566、573页。

出把股份制作为社会主义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形式，鼓励继续试点，使得股份制企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直至 1989 年下半年的治理整顿才暂时中断。

1987 年，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了“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到 1988 年底，全国预算内工商企业承包面超过了 90%。^① 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重新被调动起来，扭转了推行“利改税”之后出现的利润下降局面。然而，承包经营的缺陷依然没能克服，加上宏观改革不配套，企业面临的外在压力增大，经济效益并无显著改善。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初期，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总体上呈下滑趋势。

（2）多种经济形式获得恢复和发展

在国营企业实施改革的同时，城乡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也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由于政策的逐步放宽，城乡个体工商户蓬勃发展，由 1981 年的 182.9 万户，到 1985 年已增至 1171.1 万户。^② 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小商品等行业的生产，繁荣了市场，在方便了人民生活的同时也扩大了就业、增加了税收。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成为这一时期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到 1987 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 4743.1 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 50.3%，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③

外资企业从无到有，1980 年首家中外合资企业正式注册，到 1985 年，新登记外资企业 3254 户，是前五年总数的 1.4 倍，掀起了外资企业发展的一个高潮。^④

（3）从创办特区到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

1980 年深圳、珠海等特区的创办，在利用外资、发展对外贸易等方面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吹响了对外开放的第一声号角。经济特区突飞猛进的发展实践，不仅成为对外开放的排头兵，而且成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

1984 年 2 月，邓小平在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回京后与中央负责

^① 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50 页。

^② 《中国经济年鉴（1998）》，中国经济年鉴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32 页。

^③ 《中国统计年鉴（1988）》，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14、294 页。

^④ 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66 页。

同志谈话中，总结了对外开放的经验，提出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扩大对外开放。这一年，我国进一步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1985年，又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漳泉三角洲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至此，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1988年又设立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1991年开放了满洲里、丹东、绥芬河、珲春4个东北口岸。

（4）“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提出和第一步目标的实现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通过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大会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①从实施结果来看，20世纪80年代我国顺利地完成了“六五”和“七五”计划，提前实现了第一个战略目标。

3. 在治理整顿过程中酝酿新突破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经过连续几年的快速发展之后，经济领域一些长期积累的问题开始显现，这些问题随着价格闯关进程而突显出来。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国营企业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这些改革着重于塑造市场经济的微观经营主体；而在宏观层面的改革，则是从改革价格管理体制、逐步扩大市场调节范围开始的。1979—1984年，价格改革的做法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即以计划价格为主，同时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几种主要副产品销售价格、调整部分生产资料价格，并逐步下放一些价格管理权限。从1985年开始，价格改革的重点进入了转换价格形成机制的阶段，“调放结合、以放为主”，放开了大部分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和一些工业消费品价格，出现了生产资料价格由国家定价和市场调节价格并存的所谓价格“双轨制”的局面。

价格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物价上涨幅度比较大，出现了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等现象。1985年一度实行紧缩

^①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